治学方法

名家文化精品丛书·第一辑

导学精品

胡适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名家文化

精品丛书

治学方法

胡适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学方法/胡适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
(名家文化精品丛书·第一辑　导学精品/卞孝萱、张国星主编)
ISBN 7-205-04732-3

Ⅰ.治…　Ⅱ.胡…　Ⅲ.治学方法-文集　Ⅳ.G7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75391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606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49千字　印张:2½
印数:1-6,000册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景祥　　责任校对:宋毓培
封面设计:刘冰宇　　版式设计:王珏菲

名家文化精品丛书·第一辑　导学精品

编　委　会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总序

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开始了。这个新世纪的总体特征,我们现在难以先知先觉,更难做出十分准确的把握;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个知识的发展呈爆炸形态的世纪,是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纪。在这样的世纪里,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真才实学是难以立足的。所以,如何读书学习,如何掌握过硬本领,成为一个真正有聪明才智的人,是世纪性的课题,是每个在新世纪中生活的人都必须回答的一张严肃的考卷。要解决好这一问题,要为这张考卷做出完美的答案,找到一个正确的门径,找到科学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工如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找到正确的门径,就可以事半功倍,左右逢源;而误入歧途,必然事倍功半,南辕北辙,离开真正的目标越来越远。

那么,读书、治学的科学门径在哪里呢?虽然新世纪条件下如何读书、如何治学还不易做出科学的预见,但是鉴往可以知今,总结过去可以推知现在。20世纪直至今天的一些著名学者,特别是一些学术大师们读书与治学的路径和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确实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尤其是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黄侃、鲁迅、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学术大师,他们当年所处的新

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交会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经济文化全球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所以他们在知识结构的重组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学科上有开辟意义、有示范作用、可为我们开启法门的经典之作,对我们更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能使我们获得思想上的灵感,少走一些弯路,尽早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走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

当然,诸位名家,尤其是那些学术大师的著作部头较大,今天的读者,不易通读,也不易把握精髓;常常有望洋兴叹之感。有鉴于此,我们从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实际需要出发,以读书与治学的方法、门径为主题,以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专院校学生较快地解决治学方法、门径问题为宗旨,从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精选出反映他们读书、治学方法精髓,又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小部头著作和有代表性的单篇文章,编辑成每本几万字的小书,避免大而全,力求少而精;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容易地把握著名学者、尤其是学术大师们求知与治学方法的精华,找到科学的治学门径,把握读书、治学的要领,提高学习效率,早日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国家栋梁,在21世纪里,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编　者

2000年1月

前 言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而其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20世纪的新旧交替之际，他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破旧立新”的治学理论和治学方法。通过认真的探索，他确信有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广泛、最适用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实验主义”，其精髓就是崇尚怀疑精神，不盲从已有的定论，不迷信圣贤和权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用十分精练的语言把这种治学思想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个字。

公平地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失为十字治学格言。它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部分而且必要的思维过程，特别是包含了一种鼓励探索、反对主观武断的合理因素，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这里的“大胆的假设”不是凭空的、异想天开的“假设”，而是建立在“细心搜求事实”（《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3）的基础上的，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其关键在于指导人们在科

学研究中为其“假设”求得充分而可信的证据，让事实说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小心的求证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胡适文存》三集卷 2)，“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虽然胡适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这种提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即他认为假设只供参考之用，并不反映研究对象的原有内含，认为人类认识的进步并不表明人们对掌握自然界能力的提高，而只是用一个更为圆通的假设取代前此的假设，出现人类能否掌握客观真理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这种治学理论确实是适用而且有效的。他本人正是本着这一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敢于创新而又“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求实精神，在文学史、哲学史，以至于佛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颇有创见的探索，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在当时，不能不说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开辟了新的天地。例如在“红学”领域，他是“新红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所得出的学术结论和所用的方法，但他在“红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不移的。他的这一贡献的重要成果是其《红楼梦考证》，此书便处处体现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治学精神，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宣称的：“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而其最见功力之处是在以事实为证据的基础上，考得了《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及其家世，使人们

摆脱了那种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去附会小说里的情节，影射时事、猜度秘闻的索隐派的窠臼，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局面。对此，顾刚先生在《红楼梦辨·序》中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按，此指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这并不是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出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当然，胡适的这种治学方法不是他单纯“假设”出来的，它是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早年，胡适师事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信奉其学说，因而他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说”与杜威有系统的推理思考之“五步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不过，胡适又不完全照搬西人之学，又吸收、融入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合理成分，这主要是清代的“朴学”（即“汉学”）。他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因而他对清代汉学家的考据方法和他们在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诸种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深表钦服，并身体力行地继承和发展，而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方法来考证最普通的小说，教人知道治学的方法”（《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版）。由此可见，胡适的治学方法，是西方杜威哲学和中国传统朴学的结合体，因为他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代，本身

具备了学贯中西、开拓创新的条件。由此他提出并实践这样的治学方法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现在，我们祖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我们也面临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读书、如何治学？特别是迈向21世纪之时，这一点确实需要我们深思。在这方面，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推出这本小书。为方便读者，我们采取少而精的方式，没有选取胡适较大部头的著作，而是选取能代表和体现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治学方法而又通俗易懂的几篇文章，编成此书，并以“治学方法”为此书之名，或是或非，敬请读者赐教。

编　者

1999年11月

目　录

一、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现在有许多人说：治学问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却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么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绩。粪同溺可以作科学的分析，《西游记》同《封神演义》可以作科学的研究。

这话固然不错。同样的材料，无方法便没有成绩，有方法便有成绩，好方法便有好成绩。例如我家里的电话坏了，我箱子里尽管有大学文凭，架子上尽管有经史百家，也只好束手无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电话，请电话公司派匠人来修理。匠人来了，他并没有高深学问，从没有梦见大学讲堂是什么样子。但他学了修理电话的方法，一动手便知道毛病在何处，再动手便修理好了。我们有博士头衔的人只好站在旁边赞叹感谢。

但我们却不可不知道这上面的说法只有片面的真理。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绝大的不同。这个道理本很平常，但现在想做学问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这个极平常而又十分要紧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郑重讨论的

必要。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Darwin）伯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成立于顾炎武同阎若璩;顾炎武的导师是陈第,阎若璩的先锋是梅鷟。陈第作《毛诗古音考》(1601—1606),注重证据;每个古音有“本证”,有“旁证”;本证是“毛诗”中的证据,旁证是引别种古书来证《毛诗》。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举了本证十四条,旁证十条,顾炎武的《诗本音》同《唐韵正》都用同样的方法。《诗本音》于“服”字下举了三十二条证据,《唐韵正》于“服”字下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

梅鷟是明正德癸酉（1513）举人，著有《古文尚书考异》，处处用证据来证明伪《古文尚书》的娘家。这个方法到了阎若璩的手里，运用更精熟了，搜罗也更丰富了，遂成为《尚书古文疏证》，遂定了伪古文的铁案。有人问阎氏的考证学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

不越乎“以虚证实以实证虚”而已。

他举孔子适周之年作例。书说孔子适周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一、昭公七年（《水经注》）

二、昭公二十年（《史记》“孔子世家”）

三、昭公二十四年（《史记索隐》）

四、定公九年（《庄子》）

阎氏根据曾子问里说孔子从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条，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断定孔子适周在此年。

这都是很精密的科学方法。所以“亭林百诗之风”造成了三百年的朴学。这三百年的成绩有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证学，金石学，史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其间几个最有成绩的人，如钱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严可均，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学者。我们回顾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自然不能不对这班大师表示极大的敬意。

然而从梅鷟的《古文尚书考异》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从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

我们试回头看西洋学术的历史。

当梅鷟的《古文尚书考异》成书之日，正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1543）之时。当

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成书的第三年（1608），荷兰国里有三个磨镜工匠同时发明了望远镜。再过一年（1609），意大利的伽利略（Galileo）也造出了一座望远镜，他逐渐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镜子便成了欧洲最精的望远镜。他用这镜子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太阳的黑子，金星的光态，月球上的山谷。

伽利略的时代，简单的显微镜早已出世了。但望远镜发明之后，复合的显微镜也跟着出来。伽利略死（1642）后二三十年，荷兰有一位磨镜的，名叫李文厚（Leeuwenhoek），天天用他自己的显微镜看细微的东西。什么东西他都拿来看看，于是他在檐溜水里发见了微生物，鼻涕里和痰唾里也发见了微生物，阴沟臭水里也发见了微生物。微菌学从此开始了，这个时候（1675）正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成书的时候，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还在著作之中。

从望远镜发见新天象（1609）到显微镜发见微菌（1675），这五六十年之间，欧洲的科学文明的创造都出来了。试看下表：

年份	中　国	欧洲
1606	陈第《古音考》	
1608		荷兰人发明望远镜
1609		伽利略的望远镜

续表

年份	中国	欧洲
1610	黄宗羲生。	解白勒（Kepler）发表他的火星研究，宣布星行运行的两条定律。
1613	顾炎武生。	
1614		奈皮尔（Napier）的对数表。
1619	王夫之生。	解白勒的“行星第三律”。
1618—1621		解白勒的《哥白尼天文学要指》。
1622	毛奇龄生。	
1625	费密生。	
1626		培根死。
1628	用西法修新历。	哈维（Harvey）的《血液运行论》。
1630		伽利略的《天文谈话》。 解白勒死。
1633		伽利略因天文学受异端审判。
1635	颜元生。	
1636	阎若璩生。	
1637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笛卡儿（Descartes）的《方法论》，发明解析几何。
1638		伽利略的《科学的两新支》
1640	徐霞客（宏祖）死。	
1642		伽利略死，牛顿生。

续表

年份	中　国	欧洲
1644		伽利略的弟子佗里杰利（Torricelli）用水银试验空气压力，发明气压计的原理。
1655	阎若璩开始作《尚书古文疏证》，积三十余年始成书。	
1657	顾炎武注《韵补》。	
1660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 化学家波耳（Boyle）发表他的气体新试验。（波耳氏律）
1661		波耳的《怀疑的化学师》。
1664	废八股。	
1665		牛顿发明微分学。
1666	顾炎武的《韵补正》成。	牛顿发现白光的成分。
1667	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成。	
1669	复八股。	
1670	顾炎武初刻《日知录》八卷。	
1675		李文厚用显微镜发见微生物。
1676	顾炎武《日知录》自序。	
1680	顾炎武《音学五书》后序。	
1687		牛顿的杰作《自然哲学原理》。

我们看了这一段比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国近世学术和西洋近世学术的划分都在这几十年中定局了。在中国方面，除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部奇书之外，都只是一些纸上的学问：从八股到古音的考证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终久还是纸上的工夫。西洋学术在这几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路了。顾炎武、阎若璩规定了中国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伽利略、解白勒、波耳、牛顿规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

他们的方法是相同的，不过他们的材料完全不同。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伽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钻来钻去，总不出这故纸堆的范围；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的最大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已。实物的材料无穷，故用望远镜观天象，而至今还有无穷的天体不曾窥见；用显微镜看微菌，而至今还有无数的微菌不曾寻出。但大行星已添了两座，恒星之数已添到十万万以外了！前几天报上说，有人正在积极实验同火星通信了。我们已知道许多病菌，并且已知道预防的方法。宇宙之大，三百年中已增加了几十万万倍了；平均的人寿也延长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们的学术界还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斤斗！

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

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

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平常的水不曾分解成氢气氧气；但我们用人工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以证实水是氢气和氧气合成的。这便是创造不常有的情境，这便是创造新证据。

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动材料。自然科学的材料却可以产生实验的方法；实验便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随意创造平常不可得见的情境，逼拶出新结果来。考证家若没有证据，便无从做考证；史家若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自然科学家便不然。肉眼看不见的，他可以用望远镜，可以用显微镜。生长在野外的，他可以叫他生长在花房里；生长在夏天的，他可以叫他生在冬天。原来在人身上的，他可以移种在兔身上，狗身上。毕生难遇的，他可以叫他天天出现在眼前；太大了的，他可以缩小；整个的，他可以细细分析；复杂的，他可以化为简单；太少了的，他可用人工培植增加。

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实验的方法也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然而因为材料的性质，实验的科学家便不用坐待证据的出现，也不仅仅寻求证据，他可以根据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故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

伽利略二十多岁时，在本地的高塔上抛下几种重量不同的物件，看他们同时落地，证明了物体下坠的速率并不依重量为比例，打倒了几千年的谬说。这便是用实验的方法去求证据。他又做了一块板，长十二个爱儿（每个爱儿长约四英尺），板上挖一条阔一寸的槽。他把板的一头垫

高，用一个铜球在槽里滚下去，他先记录球滚到底的时间，次记球滚到全板四分之一的时间。他证明第一个四分之一的速度最慢，需要全板时间的一半。越滚下去，速度越大。距离的相比等于时间的平方的相比。伽利略这个试验总做了几百次，他试过种种不同的距离，种种不同的斜度，然后断定物体下坠的定律。这便是创造材料，创造证据。平常我们所见物体下坠，一瞬便过了，即没有测量的机会，更没有比较种种距离和种种斜度的机会。伽氏的试验便是用人力造出种种可以测量，可以比较的机会。这全是新力学的基础。

哈维研究血的循环，也是用实验的方法。哈维曾说：

> 我学解剖学同教授解剖学，都不是从书本子来的，是从实际解剖来的；不是从哲学家的学说上来的，是从自然界的条理上来的。（他的《血液运行》自序）

哈维用下等活动物来做实验，观察心房的跳动和血的流行。古人只解剖死动物的动脉，不知死动物的动脉管是空的。哈维试验活动物，故能发见古人所不见的真理。他死后四年（1661），马必吉（Malpighi）用显微镜看见血液运行的真状，哈维的学说遂更无可疑了。

此外如佗里杰利的试验空气的压力，如牛顿的试验白光的七色，都是实验的方法。牛顿在暗室中放进一点日光，使他通过三棱镜，把光放射在墙上。那一圆点的白光

忽然变成了五倍大的带子，白光变成了七色：红，橘红，黄，绿，蓝，靛青，紫，他再用一块三棱镜把第一块三棱镜的光收回去，便仍成圆点的白光。他试验了许多回，又想出一个法子，把七色的光射在一块板上，板上有小孔，只许一种颜色的光通过。板后面再用三棱镜把每一色的光线通过，然后测量每一色光的曲折角度。他这样试验的结果始知白光是曲折力不同的七种光复合成的。他的实验遂发明了光的性质，建立了分光学的基础。

以上随手举的几条例子，都是顾炎武阎若璩同时人的事，已可以表见材料同方法的关系了。考证的方法好有一比，比现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静听两造的律师把证据都呈上来了，他提起笔来，宣判道：某一造的证据不充足，败诉了；某一造的证据充足，胜诉了。他的职务只在评判现成的证据，他不能跳出现成的证据之外。实验的方法也有一比，比那侦探小说里的福尔摩斯访案：他必须改装微行，出外探险，造出种种机会来，使罪人不能不呈献真凭实据，他可以不动笔，但他不能不动手动脚，去创造那逼出证据的境地与机会。

结果呢？我们的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的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这三百年的考证学固然

有一部分可算是有价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绝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费心思。如讲《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汉人的“方士易”；讲《诗经》而推翻郑樵朱熹，回到汉人的荒谬诗说；讲《春秋》而回到两汉陋儒的微言大义，——这都是开倒车的学术。

为什么三百年的第一流聪明才智专心致力的结果仍不过是枉费心思的开倒车呢？只因为纸上的材料不但有限，并且在哪一个“古”字底下罩着许多浅陋幼稚愚妄的胡说。钻故纸的朋友自己没有学问眼力，却只想寻那“去古未远”的东西，日日“与古为邻”，却不知不觉地成了与鬼为邻，而不自知其浅陋愚妄幼稚了！

那班崇拜两汉陋儒方士的汉学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学精神的大师——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他们的科学成绩也就有限的很。他们最精的是校勘训诂两种学问,至于他们最用心的声韵之学简直是没有多大成绩可说。如他们费了无数心力去证明古时有“古”“脂”“之”三部的区别,但他们到如今不能告诉我们这三部究竟有怎样的分别。如顾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到底还不值得一个广东乡下人的一笑,因为顾炎武始终不知道“逼”字怎样读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学不能决定古代究竟有无入声;段玉裁说古有入声而去声为后起,孔广森说入声是江左后起之音。二百年来,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定论。却不知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一切古韵的分部都是将错就错。况且依二百年来“对转”“通转”之说,几乎古韵无一部不可通他部,如果部部本都可通,那还有什么

韵可说！

三百年的纸上工夫，成绩不过如此，岂不可叹！纸上的材料本只适宜于校勘训诂一类的纸上工作；稍稍逾越这个范围，便要闹成笑话了。

西洋的学者先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造成了科学文明，工业世界，然后用他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学方法是用惯的了。实验的习惯也养成了。所以他们的余力便可以有惊人的成绩。在音韵方面，一个格林姆（Grimm）便抵得许多钱大昕、孔广森的成绩。他们研究音韵的转变，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gren）费了几年的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

> 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

珂先生的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

我们不可以从这里得一点教训吗？

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

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J. G. 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

所以我们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学问的青年人及早回头想想。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试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

（原载 1928 年 11 月 10 日《新月》第一卷第九号，收入《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二卷）

二、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应该相同。这一点，古人也曾见到。朱子曾说："看文字须如法官深刻，方穷究得尽。"朱子少年举进士，曾做四年同安县主簿，他常常用判断狱讼的事来比喻读书穷理，例如他说：

> 向来熹在某处，有讼田者，契数十本，中间一段作伪，自崇宁政和间，至今不决，将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熹只索四畔众契，比验前后所断，情伪更不能逃者。穷理亦只如此。

他又说：

> 学者观书，……大概病在执着，不肯放下。正如听讼，先有主张乙底思想，便只寻甲的不是，先有主张甲的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

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方能辨其曲直。

在朱子的时代，有一位有名的考据学者，同时也是有名的判断疑狱的好手，他就是《云谷杂记》的作者张淏，字清源。《云谷杂记》有杨楫的一篇跋，其中说：

> 嘉定庚午（1210，朱子死后十年），予假守龙舒，始识张君清源，……其于书传间辩正谬，旁证远引，博而且确。……会旁郡有讼析赀者，几二十年不决。部使者下之郡，予因以属之。清源一阅文牍，曰："得之矣。"即呼二人叩之。甲曰：绍兴十三年，从兄尝鬻祖产，得银帛楮券若干，悉挈而商，且书约，期他日复置如初。兄后以其赀买田于淮，不复归。今兄虽亡，元约固存，于法当析。"乙曰："父存而叔未尝及此，父死之后，忽称为约，实为不可。"清源呼甲至，谓之曰："按国史，绍兴三十年后方用楮币，不应十三年汝家已预有若干。汝约伪矣。"甲不能对，其讼遂决。

杨楫跋中又记张淏判决的另一案：

> 又有讼田者，余五十年，屡置对而不得其理。清源验其券，乃政和年龙舒民与陶龙图者为市，因讯之曰："此呼龙图谓何人？"曰："祖父

也。”清源曰：“政和三年五甲登第，于法不过簿尉耳，不应越二年已呼龙图。此券绍兴间伪为以诬人，尚何言哉？”其遂俯伏，众皆骇叹。

朱子的话和杨楫的跋都可以表示十二三世纪的中国学术界里颇有人把考证书传讹谬和判断疑难狱讼看作同一样的本领，同样的证据来断定了一件过去的事实的是非真伪。

唐宋的进士登第后，大多数分发到各县去做主簿县尉，使他们都可得着判断狱讼的训练。程子（颢）、朱子都在登进士第后作过主簿。聪明的人，心思细密的人，往往可以从这种簿书狱讼的经验里得着读书治学的方法，也往往可以用读书治学的经验来帮助听讼折狱。因为这两种工作都得用证据来判断事情。

读书穷理方法论是小程子建立的，是朱子极力提倡的。小程子虽然没有中进士，不曾有过听讼折狱的经验，然而他写他父亲程珦的家传，哥哥程颢的行状，和“家世旧事”，都特别记载他家两代判断疑狱的故事。他记大程子在鄠县主簿任内判决窖钱一案，方法与张淏判的楮币案相同；又记载大程宰晋城时判决冒充父亲一案，方法与张淏判的陶龙图相同。读书穷理的哲学出于善断疑狱的程氏家庭，似乎不是偶然的。

中国考证学的风气的发生，远在实验科学发达之前。我常推想，两汉以下文人出身做亲民之官，必须料理民间诉讼，这种听讼折狱的经验是养成考证方法的最好训练。

试看考证学者常用的名词，如“证据”“左证”“勘验”“推勘”“比勘”“质证”“断案”“案验”都是法官听讼常用的名词，都可以指示考证学与刑名讼狱的历史关系。所以我相信文人审判狱讼的经验大概是考证学的一个比较最重要的来源。

无论这般历史渊源是否正确，我相信考证学在今日还应该充分参考法庭判案的证据法。狱讼最关系人民的财产生命，故向来读书人都很看重这种责任。如朱子所说的：

>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左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或疑有误也。

我读乾隆嘉庆时期有名的法律汪辉祖的遗书，看他一生办理诉讼，真能存十分敬慎的态度。他说：“办案之法，不惟入罪宜慎，即出罪亦宜慎。”他一生做幕做官，都尽力做到这“慎”字。

但是文人做历史考据，往往没有这种敬慎的态度，往往不肯把是非真伪的考证看作朱子说的“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因为文化看轻考据的责任，所以他们往往不能严格的审查证据，也往往不能敬慎的运用证据。证据不能敬慎的使用，则结论往往和证据不相干。这种考据，尽管堆上百十条所谓“证据”，只是全无价值的考据。

近百年中，号称考证学风气流行的时代，文人轻谈考

据，不存敬慎的态度，往往轻用考证的工具，造成诬枉古人的流言。有人说，戴东原偷窃赵东潜（一清）的《水经注释》。又有人说，戴东原偷窃全谢山的校本。有人说，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是偷窃章宗源的原稿。又有人说，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的秦汉三国两晋六朝的文章是攘夺孙星衍的原稿。

说某人作贼，是一件很严重的刑事控诉，为什么这些文人会这样轻率的对于已死不能答辩的古人提出这样严重的控诉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根本原因于中国考证学还缺乏自觉的任务与自觉的方法。任务不自觉，所以考证学者不感觉他考订史实在一件最严重的任务，是为千秋百世考定历史是非真伪的大责任。方法不自觉，所以考证学者不能发觉自己的错误，也不能评判自己的错误。

做考证的人，至少有明白他的任务有法官断狱同样的严重，他的方法也必须有法官断狱同样的谨严，同样的审慎。

近代国家“证据法”的发达，大致都是由于允许两造辩护人各有权可以驳斥对方提出的证据。因为有对方的驳斥，故假证据与不相干的证据都不容易成立。

考证学者闭门做历史考据，没有一个对方辩护人站在面前驳斥他提出的证据，所以他往往不肯严格的审查他的证据是否可靠，也往往不肯敬慎的考问他的证据是否关切，是否相干。考证方法所以远不如法官判案的谨严，主要原因正在缺乏一个自觉的驳斥自己的标准。

所以我提议：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

的标准：第一要问，我提出的证人证物本身可靠吗？这个证人有作证的资格吗？这件证物本身没有问题吗？第二要问，我提出这个证据的目的是要证明本题的哪一点？这个证据足够的证明那一点吗？

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干性。

我试举一例。这一百年来，控诉戴东原偷窃赵东潜《水经注》校本的许多考证学者，从张穆、魏源到我们平日敬爱的王国维、孟森，总爱提出戴东原“背师”的罪状，作为一个证据。例如魏源说：

> 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

又如王国维说：

> 其（东原）平生学说出于江慎修。……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

我曾遍检现存的戴东原遗著（“微波谢刻本”与“安徽丛书本”），见他每次引江慎修的话，必称江先生。计有：

《经考》引江说五次，四次称江慎斋先生，一次称江先生。

《经考》附录引一次，称江慎斋先生。

《屈原赋注》引四次，称江先生。

《考工记图》引三次，称江先生。

《顾氏音论跋》引一次，称江先生。

“答段若膺论韵”称江慎修先生一次，称江先生凡八次。

总计东原引慎修，凡称“先生”二十二次。其中《经考》《考工记图》《屈原赋注》，都是少年之作；《答段若膺论韵》则是东原五十四岁之作，次年他就死了。故东原从少年到临死前一年，凡称引师说，必称先生。

至于“老儒江慎修”一句话，我也曾审查过。东原在两篇古韵分部的小史里——一篇是《声韵考》的古音一卷，一篇是“六书音韵表序”——叙述郑庠以下三个人的大贡献，有这样说法：

> 郑庠分六部。
>
> 近昆山顾炎武……列十部。
>
> 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有三部。

这两篇古音小史里，郑庠、顾炎武都直称姓名，而江永则特别称“吾郡老儒江慎修永”，这是表示敬重老师不敢称名之意，读者当然可以明了。

故魏源、王国维提出的证据，一经审查，都是无根据

的谣言，都没有作证据的资格。既没有作证据的资格，我们当然不再问这件证据足够证明《水经注》疑案的那一点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杨守敬在他的《水经注疏要删》里，曾举出十几条戴氏袭赵氏的“确证”，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朱谋瑋的《水经注笺》卷七，“济水篇”注文引：

《穆天子传》曰甲辰天子浮于荥水。

赵氏《水经注释》的各本都把“甲辰”改作“甲寅”，刊误说：

甲辰，一清按《穆天子传》是甲寅。

戴氏两种校本也都改作“甲寅”。杨守敬提出这条作为戴袭赵之证，他说：

原书本是甲辰。赵氏所据何本误以为甲寅，戴氏竟据改之。(《要删》七，页九。)

杨氏所为“原书”是指《穆天子传》。天一阁本，汉魏丛书本，与今日通行本《穆天子传》，此句都作甲辰。赵潜说他依据《穆天子传》作甲寅，是他偶然误记了来源。杨守敬说“原书本作甲辰”，是不错的。

但杨守敬用这条证据来证明赵氏先错了而戴氏跟着

错，故是戴袭赵之证，那就是杨守敬不曾比勘《水经注》古本，闹出笑话来了。这两个字的版本沿革史，如下表：

残宋本作	甲寅
《永乐大典》作	甲寅
黄省曾本作	甲寅
吴琯本改作	甲辰
朱谋㙔本作	甲辰
赵一清本改	甲寅
戴震本改	甲寅

古本都作甲寅，吴琯本始依《穆天子传》改作甲辰，朱本从吴本也作甲辰。赵氏又依古本（黄本或孙潜本）改作甲寅。戴氏依《大典》本改回作甲寅。

杨守敬所见《水经注》的版本太少了，他没有见朱谋㙔以前的各种古本，脑子里先存了“戴袭赵”的成见，正如朱子说的“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的不是”。他完全不懂得《水经注》问题本来是个校勘学的问题，两个学者分头勘同一部书，结果当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同。相同是最平常的事，本不成问题，更不成证据。

杨守敬在他的“凡例”里曾说：

> 若以赵所见之书，戴氏皆能读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然谓事同道合，容有一二。岂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

这句话最可以表示杨守敬完全不懂得校勘学的性质。校勘学是机械的工作。只有极少数问题没有古本书可供比勘，故须用推理。绝大多数的校勘总是依据古本与原书所引的古书。如果赵、戴两公校订一部三十多万字的《水经注》而没有“盈千累百”的相同，那才是最有可惊异的怪事哩！

即如上文所举“甲寅”两字的版本沿革，都是校勘学最平常的事，岂可用来作谁偷谁的证据！

我举出这两个例子来表示一班有名的学者怎样轻视考证学的任务，怎样滥用考证学的方法。我最后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做这篇文字的结束。《水经注》卷二十四，“瓠子水篇”有一段文字，前面叙旧东河迳濮阳城东北，下文忽然接着说：“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曾于咸。”凡熟于《水经注》文字体例的人，都知道这两节之间必有脱文，故赵戴两本都在“春秋”上校增“又东，迳咸城南”六字，赵氏刊误之：

> 又东迳咸城南六字，全氏曰，以先司空公本校增。

杨守敬论此条说：

> 此非别有据本，以下文照之，固当有此六字。此戴袭全之证。（《要删》二十四，页七。）

他既说这六字的校增不必有本子的根据，只看下文，即知“固当有此六字”，则是无论谁校《水经注》，都曾增此六字了。为什么独不许戴东原校增此六字呢？为什么这六字可以用作戴氏袭全氏的证据呢？

用证据考定一件过去的事情，是历史考证。用证据判断某人有罪，是法家断狱。杨守敬号称考证学者，号称“妙悟若百诗，笃实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却这样滥用考证的方法，用全无根据的证据来诬枉古人作贼。考证学堕落到这地步，岂不可叹！

我们试看中国旧式法家汪辉祖自述他办理讼案是如何敬慎。他说：

> 罪从供定。犯供（犯人自己的供状）最关紧要。然五听之法，辞只一端。且录供之吏难保一无上下其手之弊。据供定罪，尚恐未真（注）。余在幕中，凡犯应徒罪以上者，主人庭讯时，余必于堂后凝神细听。供稍勉强，即属主人复讯。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讯至四五次及八九次者。疑必属讯，不顾主人畏难；每讯必听，余亦不敢惮烦也。（《续佐治导言》，“草供未可全信”条。）

被告自己的供状，尚且未可据供定罪，有疑必复讯，不敢惮烦。我们做历史考证的人，必须学这种敬慎不苟且的精神，才配担负为千秋百世考定史实的是非真伪的大责、任。

三十五年十月六日　北平东广胡同

（原载1946年10月15日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一期，收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胡适作品集》第十五册。）

三、治学“四字诀”

——致陈之藩

之藩：

对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长信，我还没答复，你提出的问题太不容易答复。那是迟迟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说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 所谓哲学的派别争论其实却由于有 Hard—minded 与 soft—minded 两大区别。费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潜刚克”与“高明柔克”的两大类。(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类。)

同样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个人一生的训练，训练是“一言难尽”的，是“终身以之”的，是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平日的训练，一旦偶然放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人的成见就无意中流露出来了。

例如，Sir Oliver Lodge 治物理学，那是他的训练。他信鬼，信灵魂，那就是性情流露与他的训练没有大关系了。

我在《丁传》里（页 55—59，97—107）（指出他的“宗教”见解，他用动物学知识来说明来证明!）他所谓“宗教”(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我曾指出他这个宗教见解，在无形之中，曾影响他对于苏俄革命及所谓“新式的独裁”的看法。这是性情的表现，其实同他的动物学与地质学无大关系。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你所说“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无大误”，很可能的是这种训练的一点点成绩，也就是你所谓“由于你的谨严的精神”。

你曾看见我写给王重民的一封信吗?（曾登在抗战时期的《图书季刊》新五卷一期。）我在那篇短文里，曾用古人论从政（做官）的四字诀来说明“治学方法”。那四个字是“勤、谨、和、缓。”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敬慎”。

其余两字，同样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和”，我解作“心平气和”，解作“平心静气”，解作“虚心体察”。(西方宗教所谓 humiliy，其实并不十分 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人，“和”之至也。)

“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

悬而不断（suspending one's 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来，常用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了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现在可以谈谈你所谓“情感”、“真实情感”、“一团火”等等名件了。

因为我注意良好的工作习惯，因为我特别重视“和”与“缓”两种美德（良好习惯），所以我很感觉“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学问的过程上是当受“和”与“缓”的制裁的。

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训练自己，其中一个重要“场合”就是我常说的“正谊的火气”。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为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所以你说，让我的文字“连一朵火焰也看不见”，这是很大的赞美辞，我怕很少人能承当。我是不敢承当的。

你说，清代三百年的考据时代“主要是因为不自由的环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说出真心的感情……？这其实是妄说，不可误信。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北宋、南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通鉴考异》，赵明诚《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

并不必“把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据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了，才运用他们的稍加训练纪律的常识，用证据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据学的来源。

这种辨别是非真伪的热情，也是一种情感，并且是一种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试读崔述的《考信录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你一定会感到火焰的热力。

故我不赞成你说的“考证的路”确实是科学的，然而“并非健康的”。你仔细想想，哪有“确实是科学的”东西而“并非健康的”！

你举的 Einstein 的故事，大概是不可靠的。Einstein 是天才和训练和合的人物，但他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他的言论，就不足为训了。

不写了，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五月、二日

（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七册，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4 年版，标题系编者所加）

四、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致罗尔纲信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之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仪，唐与元亦无太学党猗，然岂可为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

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猾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能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适　之

（载罗尔纲：《师门辱教记》1944年6月桂林建设书店出版，标题系编者所加）

五、《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的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意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

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得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

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从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的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有只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

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做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家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工。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却回到两汉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

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1736—1795年；章学诚，1738—1800年）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

> 今日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

>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

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

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宋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者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

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桩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1) 扩大研究的范围。

(2) 注意系统的整理。

(3) 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一) 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

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集团，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段玉裁曾说：

>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

>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样的位置，吴敬梓、曹雪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

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

> 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二）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例如一部《说文解字》，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方才能用这部书。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如果有人能把《说文》重新编制一番（部首依笔画，每部的字也依笔画，）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略如《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清代的学者也有见到这一层的；如章学诚说：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生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校雠通义》）

当日的学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这个见解，但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势力的时候，方才集合许多学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经籍纂诂》“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王引之序）“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精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钱大昕序）这种书的功用，在于节省学者的功力，使学者不疲于功力之细碎，而省出精力来做更有用的事业。后来这一类的书被科场士子用作夹带的东西，用做抄窃的工具，所以有许多学者竟以用这种书为可耻的事。这是大错的。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预备，国学只限于少数有天才而又有闲空工夫的少数人，并且这些少数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减少他们的成绩。偌大的事业，应该有许多人分担去做的；却落在少数人的肩膀上：这是国学所以不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人人能用古书，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

（乙）结账式的整理。商人开店，到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账结算一次，要晓得前一年的盈亏和年底的存货，然后继续进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

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账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古代结账的书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陆德明的《经典释义》，如唐宋的《十三经注疏》，如朱熹的《四书》，《诗集传》，《易本义》等，所以都在后世发生很大的影响，全是这个道理。三百年来，学者都不肯轻易做这种结账的事业。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烂账，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粤若稽古"、"关关雎鸠"说起，人人做的都是杂记式的稿本！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怪不得国学有沦亡之忧了。我们试看科举时代投机的书坊肯费整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编本编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们又看那时代的书坊肯费几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分经汇纂，"便又可以明白结账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现在学问途径多了，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更有经济的必要了。例如《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联。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子的烂账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罢"！《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我们认

为，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账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账。《诗经》的总账里应该包括这四大项：

（A）异文的校勘：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陈乔枞、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账。

（B）古韵的考究：总结吴棫、朱熹、陈第、顾炎武以来考证古音的账。

（C）训诂：总结毛公、郑玄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二千多年训诂的账。

（D）见解：（序说）总结《诗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谜的账。

有了这一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我们试看前清用全力治经学，而经学的书不能流传于社会，倒是那几部用余力做的《墨子闲诂》，《荀子集解》，《庄子集译》一类结账式的书流传最广。这不可以使我们觉悟结账式的整理的重要吗？

（丙）专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用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

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中国文化史：

（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

这是一个总系统。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但我们又觉得，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若不先做一番历史的整理工夫，初学的人实在无从下手，无从入门。后来的材料也无所统属，材

料无所统属，是国学纷乱烦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分这几个步骤：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能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惟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惟一源头。

（三）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呢？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字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

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手），就都明白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来被那方块头的分封说欺骗了，所以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用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来比较，就容易明白了。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是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各韵的区别。近时西洋学者如 Karlgren，如 Baronvon Statel-Holstein 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制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也极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议会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御史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哲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已发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韩非、王莽、王安石、李贽……一班人，若没有西洋思想作比较，恐怕至今还是沉冤莫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得李觏、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易系辞传》里“易者，象也”的理论，得柏拉图的“法象论”的比较而更明白；荀卿书里“类不悖，虽久同理”的理论，得亚

里士多德的“类不变化”的参考而更易懂。这都是明显的例。至于文学史上，小说戏曲近年忽然受学者的看重，民间俗歌近年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学接触比较的功效更不消说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术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的。

以上随便举的例，只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的，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惟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我们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史，研究这三百年的学者的缺陷，知道他们的缺陷都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又返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十二，一月

（原载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一卷）

六、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序　言

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节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

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所以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　（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　（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　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　（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　（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　（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

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

《历代名人年谱》 （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 （傅运森）商务印书馆。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 （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 （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 （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字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 （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 （丁福保等译编）上海医学书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

《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

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 （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 （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 （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 （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 （苏舆）原刻本。
《周礼》 通行本。
《论衡》 （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 （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 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 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 （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 （鸠摩罗什译）同上。
《般若纲要》 （葛蠂）《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玄奘译）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 （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 （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 （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 （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 （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 （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 （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 （一名《童蒙止观》，智颉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 （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 （窥基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 （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 （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 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大藏经》缩印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 （梁僧祐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 （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 （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 （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 （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刊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 （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

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以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 （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 （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 （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 （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 （王懋竑）广东图书馆本，湖北书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 （陆九渊）上海江左书林铅印本很可用。

《陈龙川全集》 （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 （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 （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 （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 （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本同。

《胡子衡齐》 （胡直）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彩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 （高攀龙）无锡刻本。

《学蔀通辨》 （陈建）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 （张伯行编）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

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补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 （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 （王夫之）《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 （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 （王夫之）同上。

《颜李遗书》 （颜元，李塨）《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 （费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 （章学诚）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 （胡适）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 （崔述）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 （方东树）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 （江藩）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原》 （崔适）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 （章炳麟）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 （朱熹）通行本。

《诗经通论》 （姚际恒）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 （龚橙）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 （方玉润）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 （陈奂）《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 《礼记》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 通行本。

《战国策》 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 （朱熹）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严可均编）广雅书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 （章樵注）江苏书局本。

《续古文苑》 （孙星衍编）江苏书局本。

《文选》 （萧统编）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 （刘勰）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 （郭茂倩编）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 （姚铉编）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 （郭麟编）同上。

《全唐诗》 （康熙朝编）扬州原刻本，广州本，石印本，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 （吕祖谦编）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 （庄仲方编）同上。

《南宋文录》 （董兆熊编）同上。

《宋诗抄》 （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 （管庭芬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 （毛晋编）汲古阁本，广州刊本，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 （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彊村所刻词》 （朱祖谋编刻）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 （杨朝英编）《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 （杨朝英编）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 （董解元）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 （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 （张金吾编）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 （苏天爵编）同上。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 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上海蟫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 《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 残本 董康刻本。

《明文在》 （薛熙编）江苏书局本。

《列朝诗集》 （钱谦益编）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 （朱彝尊编）原刻本。

《六十种曲》 （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 （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 （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 （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 （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 （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 （洪升）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 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苎》，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 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

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　（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　（王昶编）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　（王昶编）原刻本。

《鲒埼亭集》　（全祖望）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　（姚鼐）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　（恽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　（章学诚）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庵全集》　（龚自珍）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　（曾国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钞》　（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钞》　（黄景仁）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钞》　（郑珍）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蟪吟馆诗钞》　（金和）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钞》　（黄遵宪）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朝；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朝；

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 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 （吴承恩）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 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 （吴敬梓）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 （曹雪）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 （陈忱，自署古宋遗民）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镜花缘》 （李汝珍）此书虽有“掉书袋”的毛病，但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亚东图书馆本。

以上各种，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搜集了文学史的材料不少。《今古奇观》，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侠五义》 此书后经俞樾修改，改名《七侠五义》。此书可代表北方的义侠小说。旧刻本，《七侠五义》流通本较多。亚东图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儿女英雄传》 （文康）蜚英馆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 （吴沃尧）广智书局铅印本。

《恨海》 （吴沃尧）通行本甚多。

《老残游记》 （刘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略举十三种，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胡适）本书卷二。

（跋）文学史一部，注重总集；无总集的时代，或总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举别集。因为文集太多，不易收买，尤不易遍览，故为初学人及小图书馆计，皆宜先从总集下手。

附　录：

附录一　《清华周刊》记者来书

适之先生：

在《努力周刊》的增刊、《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我们看见先生为清华同学们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我们看完以后，心中便起了若干问题，现在愿说给先生听听，请先生赐教。

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么？先生在《国学季刊》的发刊的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这是先生在该宣言里指示我们的。既然如

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学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

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我们以为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该顾到两种事实：第一是我们的时间，第二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清华学生，从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学一年止，求学的时间共八年。八年之内一个普通学生，于他必读的西文课程之外，如肯切实的去研究国学，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件应该考虑的。第二，清华学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对于一班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这是第二件应该考虑的。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

因此，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读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至于先生在《读书杂志》第七期所列的书目，似乎是为有志专攻哲学或文学的人作参考之用的，我们希望先生将来能继续发表民族史之部，制度史之部等的书目，让有志于该种学科的青年，有一个深造的途径。

敬祝先生康健。

《清华周刊》记者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附录二　答书

记者先生：

关于第一点，我要说，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

第二，关于程度方面和时间方面，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自己随时添备。若我此时先定一个最狭义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没有伸缩的余地了。先生以为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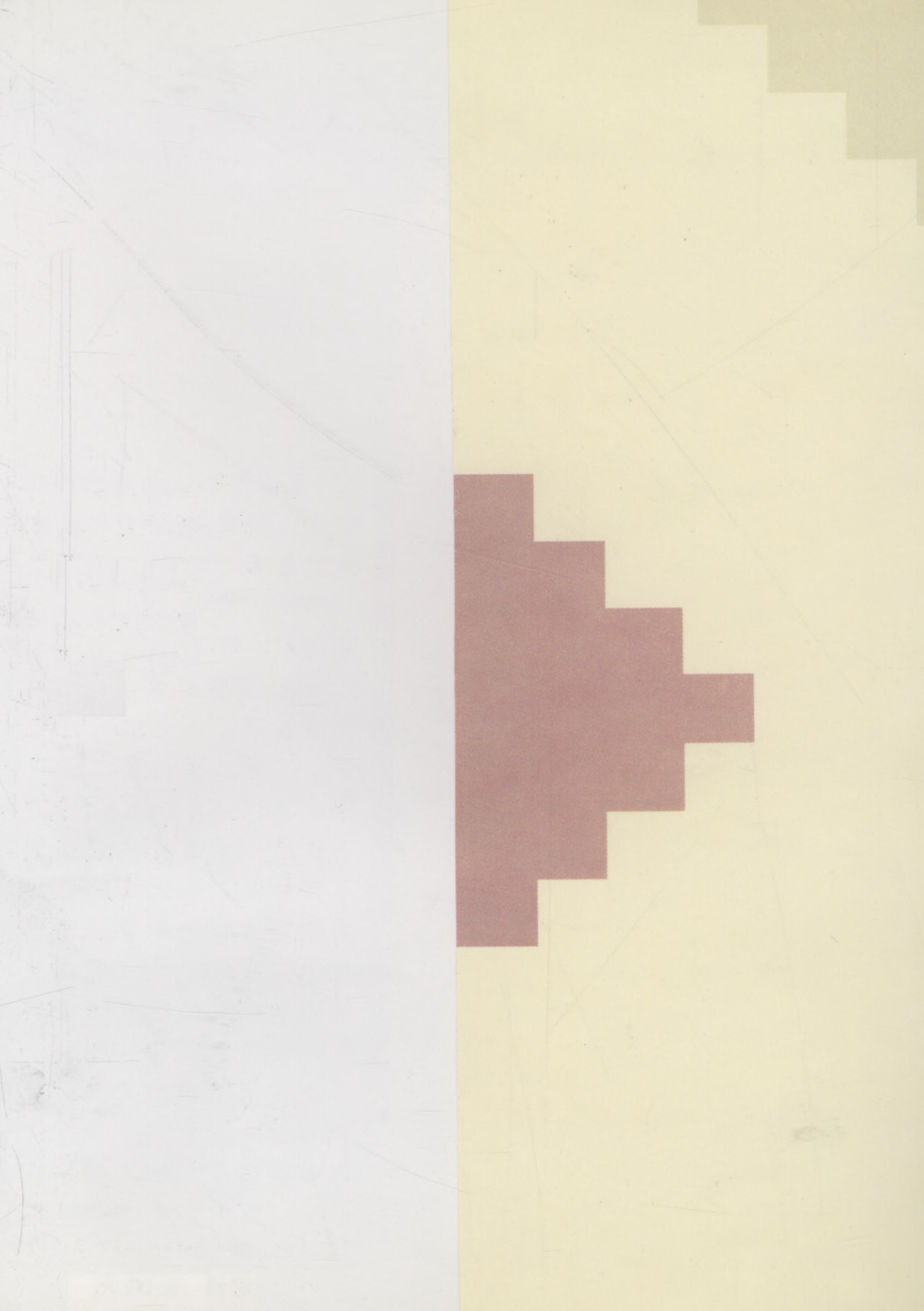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有没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

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

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上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此外还应加上一部《九种纪事本末》（铅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书：

《书目答问》	《法华经》	《左传》
《中国人名大辞典》	《阿弥陀经》	《文选》
《九种纪事本末》	《坛经》	《乐府诗集》
《中国哲学史大纲》	《宋元学案》	《全唐诗》
《老子》	《明儒学案》	《宋诗钞》
《四书》	《王临川集》	《宋六十家词》
《墨子间诂》	《朱子年谱》	《元曲选一百种》
《荀子集注》	《王文成公全书》	《宋元戏曲史》
《韩非子》	《清代学术概论》	《缀白裘》
《淮南鸿烈集解》	《章实斋年谱》	《水浒传》
《周礼》	《崔东壁遗书》	《西游记》
《论衡》	《新学伪经考》	《儒林外史》
《佛遗教经》	《诗集传》	《红楼梦》



治学方法

名家文化精品丛书·第一辑 导学精品

胡适是公认的学术大师，他在自己成就卓著的学术活动中，形成了具有“破旧立新”意义的治学方法，我们这本小书所收的几篇文章，便充分反映了这种方法的精髓,主要内容包括他有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勤、谨、和、缓”四字诀等重要论述，以及如何进行基本功训练、如何使用考据学方法、中西治学方法之间的差异及我们如何取长补短等等，虽然其中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精华部分对我们今天读书治学确实具有示范的作用、开启法门的功能、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当代学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相信会从这书中获得求知的灵感，在读书学的实践中少走一些弯路。

ISBN 7-205-04732-3/G·929